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圆明园

今年是圆明园建园311周年。

自1707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面的一块地方赏给皇四子胤禛修建园林算起，前153年的圆明园，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清帝的苦心经营，辉煌耀眼。然而，1860年后的一57年间，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焚掠，之后又不断被破坏，沦为废墟。

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离宫御苑，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为久久难解的谜——被毁之前的圆明园究竟什么样？世人还能否有机会一睹它的辉煌胜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和她的团队，历时17年，查阅10000余件历史档案，绘制4000余幅设计图纸，构建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终于让圆明园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

离宫御苑：不仅是园居游憩之地

1860年以前，北京的西北郊地区是名园汇集之地。东起今清华大学，西迄香山，皇家与私人园林多达八九十座，绵延20余里，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在这众多园林中，尤以“五园三山”，即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规模最为宏大壮美，代表着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

那么，圆明园有什么不同呢？“圆明园是常朝理政的场所。”郭黛姮告诉记者，圆明园不仅是清帝的园居游憩之地，而且是重要的听政理政之所。

“乾隆全年有168天驻跸圆明园。”清华大学贾珺博士根据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穿戴档》的记录统计出的这一结果，也是圆明园作为清代最重要离宫御苑的明证。“我们这时找到了圆明园景观设置的缘由。”郭黛姮说，圆明园的御苑性质决定了它的内容远比普通的皇家园林要复杂得多，除了丰富的景观建筑和山水花木之外，还承担着举行仪典、视事理政和日常生活功能。

据考证，圆明园中有若干农事建筑，帝王的这种园居并不仅仅是为了游赏，而是需要时时刻刻体察农情。在《御园亲耕》中，乾隆写道：“创武守以文，耕稼尤留意……谓是御园

中，朝暮便亲视。”

圆明园还设有专为皇子读书的场所“洞天别处”，告诫皇子们“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希望皇子们努力修身进德，有济天下的胸怀。圆明园设有多处书院、书屋、书楼，直接称书院的景区有汇芳书院、碧桐书院、四宜书屋，各景区中冠以书屋、书室之名的多达20余处。

“人们习惯将圆明园与山水开阔、高下相映、中轴线一脉贯通的颐和园相比，认为圆明园过于紧凑，失于凌乱。但当我们从二维的图纸转向三维的实景，并以人的视角真正行走其中，才发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并不体现在平面的秩序和逻辑，而是更关注空间格局的多变巧妙和庭院尺度的亲切宜人。”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说，“圆明园是真实住的房子，不是装修中出现的‘样板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五朝皇帝一直把圆明园当作紫禁城外的第二个“家”，而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在圆明园被毁前一直只是偶尔游赏之处。

改建频繁：并非是一成不变之园

据了解，圆明园的建设几乎年年都有，而且改建频繁。这里曾是五代帝王起居、理政、游赏之所，更有大量皇族亲贵等出没其间，无论是使用中的损耗、天灾人祸的毁坏，还是主人使用需求的更改，都会导致拆、添、改建工程。

对于这种变化，《圆明园内工则例》虽有记载，但仅靠文字难以了解其真正面貌；《圆明园四十景》只反映了1744年（乾隆九年）前后的景观，无法反映变迁的过程；样式房图档虽含有较丰富的改建信息，却有相当一部分未标明年代和所绘景区的名称。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杏花春馆”，就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田圃、村舍到后来添加规整殿宇庭院的变化。据介绍，始建于康熙年间的“杏花春馆”，前身为赐园时期十二景中的“菜圃”，当时景区一派田野村落景象。到了乾隆初期，这里兴建了土地庙、六方亭、小城关，并改称“杏花春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乾隆二十

圆明园

年——改建“矮屋”为规整院落，增添春雨轩、润壑余清、镜水斋等建筑。以往的野田村舍“杏花村”成了一处疏密有致的小园林，更名为“春雨轩”。

从“杏花村”到“杏花春馆”再到“春雨轩”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有的景区如九洲清晏用6段历史分期中的120组时空单元，复原了一个四维时空的立体圆明园。

中西合璧：西洋楼并不是灰白色

在今天的圆明园景区里，中国传统皇家园林中最早的大型欧式建筑群——西洋楼景区呈现一片灰白色。然而西洋楼其实是五彩斑斓的。

在圆明园文物库房里的“碎砖乱瓦”中，研究人员试图将200余块琉璃构件“拼”回原处，并辨识出其中12件属于谐奇趣。同时，多彩琉璃构件在黑白老照片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高光，激发出一个大胆的尝试：给西洋楼“上色”。

作为3D复原团队中西洋楼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说：“一开始，我们主观地认为黑白老照片上深色的构件，应该匹配实物颜色同样较深的蓝色；反之，较浅的部分则对应黄色、绿色的琉璃构件。”但随着被定位的琉璃构件越来越多，高明发现：与之前的臆断相反，所有蓝色的构件在老照片中呈现出较浅的灰色，而黄色、绿色则呈现较深的灰色。

与此同时，“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也在丝绸之路东西方商贸交流的背景下走出国门，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出现了中国风园林的热潮”。郭黛姮告诉记者，法国大型园林中出现了村落景观；英国建筑师钱伯斯在伦敦郊外设计建造的邱园塔，塔上塑着80条龙，以琉璃装饰。

“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物的壮丽和数量上曾经与中国相当。圆明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在1772年出版的《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中，钱伯斯写道。

郭黛姮评价说：“圆明园以它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与文化史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

摘自《光明日报》

■史海钩沉

我们今天的休息是依照“星期制”而行的。在明朝末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国人知道了星期制。但这一西方作息制度真正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则与开埠后的上海有关。

星期制是怎样进入国人生活的

中国过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制是个舶来品

中国过去没有星期制（礼拜制）。平日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与日相应，息与夜相得也。”（王充《论衡》）就是在笔者上山下乡的上世纪70年代，早已实行了星期制，却还有农业社会的遗风，不但是种田靠天，休息也是。那时的农场，下雨天可以不出工，在家休息。于是，大家就把这日历上没有的休息日叫做“外国礼拜天”。

星期制是个舶来品。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就有“七日一周”的历法。到了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宣布7天为一个星期。

据说，它起源于公元前约2000年的古代两河流域。巴比伦人认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流值日，各管一天。“星期”即为星的日期的意思。另一传说则与《圣经》有关。说连续工作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在第七天“歇了他的工，安息了”。于是，这天就成了星期天。称作“礼拜”，这天与基督徒的“礼拜日”同日。这里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如果当时上帝早就吃力了，或是提前完成创造万物，恐怕就做五休二，那一周双休就始于那时了。

在中国，也有如同星期制的作息制度。在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但这个休息日不固定不统一，轮到哪就休到哪。而且只对公务员，不对社会全体成员。到了唐朝，官员的休息间隔被拉长成“旬假”（一说是与“休沐”并存），也就是十天一休。至明清，“旬假”就没了。而对平民百姓来说，共同的休息日则是在节庆里，主要有春节、冬至以及皇帝的生日。

星期制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

开埠后，上海人看到了身边外国人享受星期制的快乐和惬意。

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5月8日出版的《申报》上，有《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一文。其中写道：“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摘自《解放日报》